

特刊序

社會投資與臺灣福利發展

林宏陽*

隨著英國社會學家 Anthony Giddens (1994, 1998) 提出第三條路 (The Third Way) 思維，擷取社會民主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福利國家論述的優勢，進一步構思發展適合於當代社會政策的方針與手段。該思維所論述的政策方向與方法，大致上係以社會投資 (social investment) 理念為內涵，並同時藉此發展各國不同形式的積極性社會政策 (active social policy)。雖其政策範疇仍在發展中，但就理念的內涵以及當前學術與政策實務界所探討的範圍，多在於家庭政策、積極勞動市場政策 (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y) 與教育政策等三個領域 (Bonoli, 2013; Esping-Andersen, 2002)。此等政策在搭配社會投資理念規劃時，從一開始著眼於生命週期 (life cycle) 轉為注重生命歷程 (life course)。換言之，引導社會投資政策進一步考量福利服務與給付之輸送，如何能夠為下一個生命階段 (life stage) 奠定基礎，使其得以在生命階段之間，乃至於在個別生命階段裡的生命歷程順利轉銜、避免遭遇被排除的困境 (Kvist, 2014)。

對此，政策的內涵專注於將社會安全制度中的福利給付，轉為諸多的實物給付與福利服務，提供予家庭、兒童、工作年齡人口、高齡者等，以盡可能減緩其所面對的不利處境 (Kuitto, 2016)。歐洲執行委員會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2013a, 2013b) 亦據此擬定 2014 至 2020 年的社會投資政策方針，即社會政策配套措施 (Social Investment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

Package, SIP)，將歐盟政府的社會基金（European Social Funds）投入從兒童、家庭、工作年齡人口到高齡者的全人化服務與給付。以高齡化社會的政策方針為例，將該基金投入活躍老化政策（active ageing policies）與醫療服務，以充分滿足工作年齡人口轉銜進入高齡階段時的照顧服務需求，並同時藉此協助其持續從事社會性或經濟性的社會參與（Zaidi, Harper, Howse, Lamura, & Perek-Białas, 2018；林宏陽，2021）。就整體而言，如 Hemerijck (2017) 所論述，社會投資政策的三項主要功能分別為藉由福利服務與給付提升與維持個人的人力資本「存量 (stock)」、使個人在生命階段與個別生命階段中的轉銜與「流動 (flow)」更為順遂且避免落入貧窮，以及使服務與給付能夠協助個人在不順遂的期間獲得「緩衝 (buffer)」的可能。

然而，對於社會投資論述的發展，Ruth Lister (2004) 指出其於社會政策的討論大致有幾層意義。首先，其內容包含社會政策的規範理念（normative ideal）。由於在家庭政策領域多著眼兒童與社區於社會投資措施之下，後續如何建構一個富裕、共融、共享且永續的社會，係運用新自由主義的公民（citizenship）培力概念。換句話說，強調使用服務與給付者應對社會有一定程度的責任感（responsibilities），並能據此持續取得所需的福利服務與給付，乃至於勞動市場上的合適的（decent）機會（opportunities）（O'Connor & Robinson, 2008）。第二，社會投資論述被視為回應當代諸多經濟與社會挑戰的實用性回應（pragmatic response）。質言之，該理念所著重的政策方向，係以投資於年輕人口群的人力與社會資本，一方面穩固整體社會於未來的生產力，另一方面使未來的工作世代，無論是個人或其家庭，皆不至於面臨貧窮的困境。如此一來，以具有目標的投資方式為措辭，較易獲得政治上的支持。第三，社會投資論述亦可被做為檢視福利國家發展的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由於依循社會投資理念而發展與調整的當代福利國家，雖然大致被統稱為社會投資國家（social investment state），但實際上具有諸多樣態。因此，藉由觀察各國在社會投資相關

政策領域的多元發展，能夠瞭解不同福利國家典範的動態(dynamics)。

就當前的發展觀之，社會投資理念於當代主要的後工業國家(post-industrial states)推動知識經濟(knowledge economies)的過程之中，用以維持與提升勞動力的生產知能，使個人能夠獲得足夠的配備而成為當代社會所期待的公民樣態，而非如傳統福利國家採取以「修復(repair)」為核心概念的消極性服務與給付制度(Garritzmann, Häusermann, & Palier, 2021)。其主要理念，著眼於家庭政策、教育與訓練政策，以及積極勞動市場政策，並藉由提供福利服務取代傳統福利國家因著重於消極性現金給付所導致的福利依賴議題。至於所涵蓋的制度面向，係以解決個人在生命歷程中可能因無法獲得足夠的福利服務與現金給付的支持而落入貧窮或被排除的困境，故而賦予相關的政策一定的目的、目標與功能。就歐盟政府甚且規劃投入歐盟社會基金，促進以社會投資理念為核心的社會政策得以順利施行，便能充分瞭解此等理念的重要性。即便如此，隨著相關政策領域結合社會投資思維以行的同時，承前所述，仍有諸多的面向需被探討與研究；此為本特刊匯集的五篇著作所欲呈現與探究的議題與範疇。以下將從鉅視的論述內容到微視的人口群與政策層面為安排方式，並依序描述各篇的重要性與主要論點。

首先，阮曉眉所撰寫的〈新自由主義化的社會投資：經濟化、人力資本與國家治理〉一文，即嘗試回應 Lister (2004) 與 O'Connor 及 Robinson (2008) 論及社會投資運用新自由主義的精神而發展的規範理念，並探究社會投資論述的可能發展。該文指出，雖然依循第三條路論述所發展的社會投資理念，認為社會政策能夠妥善擷取社會民主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優點，進而回應社會與經濟面向的諸多挑戰。但若以 Michel Foucault 的知識型與治理性概念分析之，則發現社會投資理念大致承繼新自由主義的治理模式以及知識與技術之形成等面向的論述與運作方式；其影響或更加深遠。舉例而言，Keynes (1936) 在其經典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所探究的投資樣貌與總體經濟

長遠發展間的關係時，認為貨幣性的投資（monetary investment）並未能充分且直接促進整體經濟的發展，反可能造成不必要的通貨膨脹；反之，若政府投入硬體設施的建置（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則可促進就業與薪資所得，乃至於整體社會後續的經濟成長。

然而，當代的社會投資論述則以與知識經濟密切相關的政策領域，諸如教育、文化、勞動力、福利服務與給付等被視為可投資的商品，甚至於納入國家體系治理的範疇，從而運用政治與個人主義之措辭（rhetoric）定義合理的積極性公民（active citizenship）樣貌、應負的責任（responsibility）與附加的懲罰（sanction）等，並以此呼應競爭（competition）、積極（activation）、生產力（productivity）、產業貢獻（industrial contribution）或 Titmuss (1974) 所謂的工業成就（industrial achievement）、可僱用性（employability）等價值，藉此建立活躍的社會（active society），進一步深化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Dobbernack, 2014: 43; Kourachanis, 2020: 4 and 71; McDonald & Marston, 2002: 387; Sanders, 2016: 200）。因此，工業革命以來的勞動商品化之負面結果，藉由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大量建置的福利國家所提供之福利服務與給付，使勞動者得以一定程度去除商品化的不良成果；亦即福利服務與現金給付的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效果（Esping-Andersen, 1990; Polanyi, 1944）。但是，因為過多消極性福利給付所造成的福利依賴議題，使傳統福利國家走向以積極性為目的與目標的社會政策路徑，諸如以福利促進工作（welfare-to-work）與社會投資論述所推展的政策模式，使獲給付者重回勞動市場的再商品化（re-commodification）歷程，而複製、加深製造弱勢者的體制（Dale, 2010; Offe, 1984）。據此，該文認為應將能力取向論述與審議式民主帶入社會投資論述之中，方可能扭轉目前的發展方向，並建構一個重視社會連帶（social solidarity）與再分配（redistribution）機制、協力與共享精神，以及不同階級與職業身份別能達到充分平等的社會。

第二篇文章，由賴定佾、葉崇揚與古允文三位共同發表的著作，

則以〈社會投資福利國家的多樣性－社會支出結構的檢證〉為題，嘗試運用社會投資理念分析福利國家的樣貌。該文首先指出，傳統福利國家在 1970 年代的兩次能源危機之後，逐漸面對就業安全、薪資所得維持與財政平衡等三個社會政策的難題，使各國原來運作的福利模式有所調整 (Ferrera, 2014; Kerstenetzky & Guedes, 2021)。由於各國皆有過去所採取的福利模式，故而新自由主義模式、社會民主模式與保守主義模式各有其所依循的調整路徑，以致於在選擇回應的政策領域、制度內涵與樣貌，以及資源分配模式等皆有所不同。然而，若欲探究不同福利國家典範的動態調整方式，並無法從整體社會支出佔 GDP 的比重瞭解前述的異同，故而採用 OECD 國家的社會支出資料庫 (Social Expenditure Data Set, SOCX) 之數據為基礎，以分解式社會支出方法 (disaggregated social expenditure) 著手分析。如此一來，得藉由不同政策領域支出所佔的 GDP 比例，更為瞭解個別國家所著重的政策面向，進而歸類與探討不同型態的社會投資福利國家。此等分析方式，較早期的論述，則如 Francis G. Castles (1994) 的研究反思：社會支出規模相近的國家，其建構的福利模式卻如此不同，應無法被視為相同類型的福利國家。其論點特別指出，雖然新加坡的社會支出規模與其他歐陸福利國家相當，但其著重於中央公積金制度 (Central Provident Fund, CPF) 所提供的給付形式與項目，且以給付水準至為有限的公共救助制度 (Public Assistance Scheme) 維持低度所得水準的社會政策模式，與總體支出水準相仿的歐洲福利國家意識型態及政策價值大相逕庭。後續的相關研究，藉由更為細緻的統計數據，進一步瞭解個別福利國家的不同福利服務與給付之組成，探究福利國家的類別與屬性，乃至於福利國家典範的調整與動態等，得以更明確的呈現 (Castles, 2008; Castles & Obinger, 2007; Garritzmann & Seng, 2020; Kuitto, 2011; Obinger, 2021)。

依循諸多社會投資福利國家，以及分解式社會支出分析方法的相關研究與論述，其研究將各國專注於促進個人技術與培養個人能力為主要目的與目標的政策項目，歸類為社會投資福利國家在社會支出面

向上所可能呈現的樣貌。據此，將屬於消極性社會政策的失業保障制度與年金保險制度所提供之現金給付排除，而僅納入具有積極性意涵的家庭政策、積極勞動市場政策與教育政策等三個領域，並比較各國在此三類政策的整體支出所佔之 GDP 比例。其結果發現，在社會民主主義福利模式的國家中，除了相對消極性的年金給付所佔的比例最高外，第二與第三的主要社會支出項目則分別為教育與家庭政策。就該類國家自 20 世紀中期的社會政策轉型後，往往以瑞典為例，便維持當前所論述的社會投資福利國家之發展方向 (Bengtsson, 2014; Bengtsson & Berglund, 2012)，故可謂延續一直以來的政策面向與路徑，而少有大幅度的調整。屬於新自由主義福利典範的國家之中，相較於其他福利典範類型的國家，著重在教育政策上的人力資本培力，並同時提供工作福利模式 (workfare) 的服務與給付，使市場機制在勞動力供需的調控與勞動條件等的決定保有相當大的空間，而國家則專注於管制者 (regulator) 的角色。至於歐陸的保守主義福利國家，雖也逐步著重於家庭政策與人力資源培力政策上，但由於長久以來的福利意識型態係以性別分工的男性養家模式 (male-breadwinner model) 為主軸，而女性擔負家務勞動角色的家庭與勞動市場結構在各國皆有所轉變，且各國在家庭政策的發展步調不一，而可觀察到政策發展上的顯著差異。對此，該研究指出，法國與荷蘭在家庭政策與教育政策的推動相對積極，德國較為著重家庭政策的面向，而西班牙與義大利則呈現顯著的落後。最後，東亞福利國家之中，主要以日本、韓國與台灣為分析對象，發現未有明確的發展方向。但是，仍可觀察到因為發展脈絡相較晚於歐陸各國，人口結構的老化速度加快以及勞動市場政策成為關注的焦點，使得年金給付與失業給付的總體支出成長。至於東亞國家普遍著重的教育政策，支出比例的發展方向穩定；而傳統的男性養家與性別分工模式仍延續，故家庭政策的支出佔比仍相對較低。

陳芬苓的〈社會投資觀點的性別分析－以臺灣女性創業方案為例〉一文，為本期的第三篇文章，則進一步從我國福利體系的男性養家模

式設定，探討當前的幾項女性創業方案，能否被視為社會投資政策？若可以，是何等的社會投資政策？政策的目的與目標是否符合當代台灣女性欲同時兼顧家務勞動與就業的需求？質言之，如 Mahon (2013: 153) 與 Saraceno (2015: 261-262) 所強調，相關的學術論述雖指出以社會投資論述為基礎的社會政策將能夠促進性別平等，但由於政策的目標係透過福利服務與現金給付盡可能將勞動力推回勞動市場之中，且未特別針對性別設計相對應的服務與給付，其結果將使女性的不同角色與生命歷程逐漸與男性趨近，亦即男性化（masculinisation）。如此一來，當個別國家的社會、家庭、工作倫理等價值之預設係以男性養家模式為核心時，即便不分性別角色給予家庭給付、平等運用工作與家庭平衡措施等，但家務勞動的責任仍落在女性的身上。換句話說，在此等社會投資政策之下，僅止於將女性的角色進一步工具化，例如在生育（reproduce）、家務勞動與經濟性有給工作（economically gainful employment）等方面，而未實質平等觀之。此外，Jenson (2009: 466) 認為，社會投資的另一個政策思維，在於從個人生命歷程著眼，藉由家庭政策、教育政策與人力資源培力等措施，預防其落入貧窮的可能。據此，意味著女性隨著就業、生育等生命歷程，乃至於部分社會投資福利國家較為注重育嬰假（maternity leave）而非親職假（parental leave），以及思考整體社會的人口結構老化與少子女化等議題所設計之政策內涵，從而加深女性在經濟安全、就業安全與社會安全等層面上的不平等。據此，或可說明，社會投資論述所謂的促進性別平等之政策目標，僅只為一項口號、標誌（hallmark），尚未被確切實踐。

延續前述的論點，佐以陳芬苓老師的這篇研究可發現，我國自1990年代以來所施行的諸多女性就業貸款、創業方案等，雖然著力於提升女性單親家戶長的人力資本存量，並增進其以創業的方式投入就業的可能性，但充其量為一讓女性更鑲嵌於生育、養育與照顧責任以及就業等角色所交織的社會體系之中。究其政策的結果，並未純然關注於女性的就業與職涯發展前景。因此，該篇研究於文末指出，我國

的社會投資政策若欲同時考量女性的實質需求，則不應忽略傳統福利國家所設定的女性家務勞動角色與價值仍影響我國社會、家庭、勞動市場等面向的運作模式。依此觀之，此等社會投資政策仍須維持對於女性人力資本存量與培力的政策目標，同時持續提供一定程度的福利服務與現金給付以保障其經濟安全需求。其論點或可理解為，兼具「存量」與「緩衝」功能的政策配套，以讓因為投入各種被社會與家庭賦予的照顧責任後，若仍欲重回勞動市場，能夠藉此機制順遂其生命歷程與生命階段之間的「流動」。

第四篇由劉佑學與王舒芸合作撰寫的〈誰是時間權利的富爸媽？—育嬰假社會「投資」了誰？〉一文，可謂延續前一篇文章的論述，並進一步探究社會投資福利國家所著重的家庭政策，特別在於育嬰假的設計與運用，對於性別角色間的平等，乃至於女性在勞動市場、家庭以及整體社會的不利處境是否能因此緩解。此篇論文以台灣的育嬰假制度為研究對象，結合實證數據與相關理論，提出幾項批判。第一，依據現行的規範，若非受僱者並為就業保險被保險人，則未能請領相關給付。換言之，若未依循從事經濟性有給就業的正向價值、服膺於雇主所期待的工作倫理，乃至於對整體經濟社會之成長與生產有所貢獻，則國家未能提供相對應的福利服務與現金給付。更為精確的說，台灣的育嬰假政策，充分展現生產主義式的福利資本主義(Productivist Welfare Capitalism)之特質(Holliday, 2000)。第二，其研究指出台灣育嬰假制度預設雙薪家庭(dual earner-ship 或 double-income households)的樣貌，因為《性別工作平等法》第22條規範，配偶未就業之被保險人不適用帶薪的育嬰假。然而，此等制度規範與國際間的相關實證研究所提醒者相反。質言之，單薪家戶與單親家戶落入貧窮的風險顯著高於雙薪家戶(Cantillon, 2011: 446; Noël, 2020: 860)，但我國的政策思維卻設定單薪家戶能有家庭成員專心提供照顧服務與家務勞動，而排除於制度的適用範圍，反可能進一步加深其經濟不安全的處境。因此，以育嬰假的政策範疇觀之，此等給付請領機制將有利於經濟能力

相對強勢的雙薪家戶，從而證實社會投資福利國家被顯著觀察到的資源分配不平等之議題（Sakamoto, 2021）。

第三，順著前述的實證研究發現，我國的育嬰假政策所存在的「適用」與「使用」之困境，進一步交織為社會投資福利國家在資源分配方面常被批判的「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亦即，富者愈富，貧者益貧的結果（Bonoli et al., 2017; Pavolini & Van Lancker, 2018）。據此，由於我國勞動市場以及社會與家庭價值的狀態使然，女性在使用具備社會投資概念的育嬰假之後未重回勞動市場的比例高於男性，且存在高薪者重回就業的比例顯著高於低薪者的結果；換句話說，並未能充分發揮「流動」的政策特性。如此一來，或也說明，在勞動市場對女性相對不友善的原則設定，同時考量人口結構老化可能進一步加深勞動人口不足的隱憂而發展的社會投資政策，實際上只會使女性更陷於就業安全與經濟安全的雙重不利處境（Parolin & Van Lancker, 2021）。至於社會投資政策所關注的提升人力資本之「存量」功能，以及取代所得中斷期間的部分薪資所得之津貼給付的「緩衝」特質，也因為一方面未能顧及以職業訓練與教育維持並提升個人的人力資本，與另一方面僅提供限定人口群一定期間的薪資所得替代，最終並無法獲得制度使用者重回勞動市場的結果。以致於，如該研究的結論提及，認為帶薪育嬰假政策能夠確切達成社會投資目的與目標之受訪者比例，逐年下降。

本期的第五篇文章，係由林宏陽所撰寫的〈經濟緊縮期間的社會投資政策：德國與臺灣的比較分析〉一文。該研究以德國的「短工津貼（Kurzarbeitergeld）」制度為例，比較與檢視台灣現行的緊縮期間就業安定政策，探討其所具備的社會投資特質，並探討台灣未來的政策調整方向。其主要的論述，在於回應各國運用社會投資理念所建構的就業安全制度，如何、在何等的程度上能夠因應經濟與社會的挑戰。德國勞動市場能夠相對安穩度過 2007 年的金融海嘯與 2020 年的疫情期間，短工津貼制度具有關鍵性的貢獻。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Paul Krugman

(2009) 在 2007 年金融海嘯大致回穩時，依據其觀察發現，德國之所以能夠相對平穩地度過該次的經濟緊縮，主要在於其常態性施行的短工津貼制度，在該期間得以調整與因應當時各產業所面臨的工時大幅縮減之困境。此外，Krugman (2020) 進一步指出，在 2019 年年底以來的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蔓延全球之際，也再次展現政策所欲維繫的就業安全目標，使損失的薪資所得能夠獲得補償，且受僱者的人力資本存量得以維持與提升，進而於該期間在一定程度上保有成熟的勞動力。如此一來，藉由失業保險基金補償被保險人縮短工時所導致的所得損失，並讓受僱者在該期間能夠停留在原單位，藉此維持過去所累積的生產知能與生產力，甚或搭配相關的職業教育與訓練課程，增進其相關的知識、能力與經驗等。再者，亦展現傳統保守主義福利國家透過原已具備的社會團結 (social solidarity) 精神，使其得以度過難關 (Sacchi, Pancaldi, & Arisi, 2011)。然而，需特別強調者在於，Heuer 與 Mau (2017) 認為此等團結型態的本質有所改變；由於社會大眾對政府的信任不若以往，團結的面向將不如過去的全面。事實上，社會投資理念在融入新自由主義論述的部分，使福利與就業兩個政策領域緊密結合，進一步朝向以生產性、積極性、勞動再商品化為目的與目標的政策設計而去。所以，即便此等政策方向可能造成資源分配上的不平等，社會成員則未能回頭檢視與支持相對全面性的重分配機制。

根據此等政策理念的發展與政策成效的展現，國際間為數不少的學術與實務工作者仍認為，德國的短工津貼制度係以失業保險基金為財源，提供被保險人於縮短工時期間的經濟安全保障，故應屬消極性的社會安全制度，而非結合社會投資理念的政策。但有部分學術工作者指出，在整合社會投資的論述之後，短工津貼制度並非純然的消極性策略，而確實在建構積極性社會的過程中，被賦予更多的積極勞動市場政策意涵 (Fischer & Schmid, 2021)。林宏陽在本文亦指出，若以「存量」、「流動」與「緩衝」三個社會投資政策的特性檢視之，短工津貼制度本身所具備的經濟安全維持、使受僱者不因立即性的失業而無

法維持其經濟生產性的知識與能力，以及協助其於經濟緊縮期間得顧及家庭與工作之平衡，乃至於就業的轉銜等特質，在在符合社會投資論述的目的與目標。此外，該文亦嘗試以社會投資論述，探討我國在前述兩個期間仿效短工津貼制度所擬訂的「僱用安定措施」，以及與之相互搭配的各项職業訓練方案之政策性質。該研究指出，雖然我國相關制度在「存量」、「流動」與「緩衝」三個政策特質皆完備，但由於「僱用安定措施」的啓用機制設計不良，以及各項職業訓練方案的設計反限制雇主運用勞動力之彈性、增加雇主的經營風險，且未必能夠確切維持或提昇受僱者的經濟生產知能，故實際運作並無法展現社會投資政策的特性。據此，提出我國現行制度的調整方向與思維。

綜上所述，本期「社會投資與台灣福利發展」特刊，可謂相當全面性的呈現社會投資論述各個層面的討論。一方面，從鉅視層面思考社會投資的理論意涵與本質及其未來可能與應有的走向，以及藉由分解式社會支出方法分析與歸納不同類型的福利國家典範在社會投資政策的發展。另一方面，則較微視的梳理台灣的福利發展脈絡，並聚焦於女性創業方案、育嬰假政策與疫情期間的就業安全政策等三個政策的比較、分析與論述。因此，就本期所收錄的五篇文章觀之，是當前台灣關於社會投資理念相當重要的著述，對於台灣社會政策領域的貢獻應至為顯著。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林宏陽（2021）。〈歐盟國家社會投資概念在活躍老化政策之意義及其對台灣之政策意涵〉，施世駿（主編），《人口高齡化與社會福利－社會投資的反思》，頁 239-279。苗栗縣：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行政院衛生福利部。

二、英文部分

- Bengtsson, M. (2014). "Towards Standby-ability: Swedish and Danish Activation Policies in Flux."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3(S1): S54-S70.
- Bengtsson, M. & Berglund, T. (2012). "Labour Market Policies in Transition: From Social Engineering to Standby - Ability." In Bengt Larsson, Martin Letell and Håkan Thörn (eds.), *Transformations of the Swedish Welfare State: From Social Engineering to Governance?*, pp.86-103.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Bonoli, G. (2013). *The Origins of Active Social Policy: Labour Market and Childcare Policie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noli, G., Cantillon, B. & Van Lancker, W. (2017). "Social Investment and the Matthew Effect: Limits to a Strategy." In Anton Hemerijck (ed.), *The Uses of Social Investment*, pp.66-7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ntillon, B. (2011). "The Paradox of the Social Investment State: Growth, Employment and Poverty in the Lisbon Era."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1(5): 432-449.
- Castles, F. G. (1994). "Is Expenditure Enough? On The Nature of the Dependent Variable in Comparative Public Policy Analysis."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32(3): 349-363.
- Castles, Francis G. (2008). "What Welfare States Do: A Disaggregated Expenditure Approach."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38(1): 45-62.
- Castles, F. G. & Obinger, H. (2007). "Social Expendi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Redistribution."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17(3): 206-222.
- Dale, G. (2010). Karl Polanyi: *The Limits of the Marke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Dobbernack, J. (2014). *The Politics of Social Cohesion in Germany, Franc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Esping-Andersen, G.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Esping-Andersen, G. (ed.) (2002). *Why We Need A New Welfare St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uropean Commission. (2013a).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Towards Social Investment for Growth and Cohesion - Including Implementing the European Social Fund 2014-2020*. Brussels: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an Commission. (2013b). *Policy Roadmap: for the 2013-2014 Implementation of the Social Investment Package*. Brussels: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Ferrera, M. (2014). "Ideology, Parties and Social Politics in Europ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37(2): 420-438.

Fischer, G. & Schmid, G. (2021). *Unemployment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COVID-19: Better Constrained in the Corset of an Insurance Logic or at the Whim of a Liberal Presidential System? (WZB Discussion Paper, No. EME 2021-001)*. Berlin: Wissenschaftszentrum Berlin für Sozialforschung (WZB).

Garritzmann, J. L., Häusermann, S. & Palier, B. (2021). "Social Investment." In Daniel Béland, Kimberly J. Morgan, Herbert Obinger and Christopher Pierso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Welfare State* (2nd ed.), pp.188-20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arritzmann, J. L. & Seng, K. (2020). "Party Effects on Total and Disaggregated Welfare Spending: A Mixed-Effects Approach."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59(3): 624-645.

Giddens, A. (1994).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Giddens, A. (1998).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Hemerijck, A. (2017). "Social Investment and Its Critics." In Anton Hemerijck (ed.), *The Use of Social Investment*, pp.3-4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uer, J.-O & Mau, S. (2017). "Stretching the Limits of Solidarity: The German Case." In Peter Taylor-Gooby, Benjamin Leruth and Heejung Chung (eds.), *After Austerity: Welfare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Europe after the Great Recession*, pp.27-4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lliday, I. (2000). "Productivist Welfare Capitalism: Social Policy in East Asia." *Political Studies* 48(4): 706-723.

Jenson, J. (2009). "Lost in Translation: The Social Investment Perspective and Gender Equality." *Soci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der, State & Society* 16(4): 446-483.

Kerstenetzky, C. L. & Guedes, G. P. (2021). "Great Recession, Great Regression? The Welfare State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45(1): 151-194.

Keynes, J. M.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Kourachanis, N. (2020). *Citizenship and Social Policy: From Post-War Development to Permanent Crisis*.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Nature.

Krugman, P. (2009). "Free to Lose." In.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2. <http://www.nytimes.com/2009/11/13/opinion/13krugman.html>. Retrieval Date: 2020/08/18.

Krugman, P. (2020). "Will We Flunk Pandemic Economics?" *New York Times*, April 06.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06/opinion/>

coronavirus-economy.html. Retrieval Date: 2020/08/18.

- Kuitto, K. (2011). "More Than Just Money: Patterns of Disaggregated Welfare Expenditure in the Enlarged Europe."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1(4): 348-364.
- Kuitto, K. (2016). "From Social Security to Social Investment? Compensating and Social Investment Welfare Policies in a Life-cours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6(5): 442-459.
- Kvist, J. (2014). "A Framework for Social Investment Strategies: Integrating Generational, Life Course and Gender Perspectives in the EU Social Investment Strategy."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13(1): 131-149.
- Lister, R. (2004). "The Third Way's Social Investment State." In Jane Lewis & Rebecca Surender (eds.), *Welfare State Change: Towards a Third Way?*, pp.157-18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hon, R. (2013). "Social Investment According to the OECD/DELSA: A Discourse in the Making." *Global Policy* 4(2): 150-159.
- McDonald, C. & Marston, G. (2002). "Patterns of Governance: The Curious Case of Non-profit Community Services in Australia."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36(4): 376-391.
- Noël, A. (2020). "Is Social Investment Inimical to the Poor?" *Socio-Economic Review* 18(3): 857-880.
- O'Connor, J. S. & Robinson, G. (2008). "Liberalism, Citizenship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 Wim van Oorschot, Michael Opielka, & Birgit Pfau-Effinger (eds.), *Culture and Welfare State: Values and Social Polic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29-49.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Obinger, H. (2021). "Social Expenditure and Welfare State Financing." In Daniel Béland, Kimberly J. Morgan, Herbert Obinger and Christopher Pierso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Welfare State* (2nd ed.), pp.453-47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ffe, C. (1984).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Hutchinson.
- Parolin, Z. & Van Lancker, W. (2021). "What A Social Investment 'Litmus Test' Must Address: A Response to Plavgo and Hemerijck."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31(3): 297-308.
- Pavolini, E. & Van Lancker, W. (2018). "The Matthew Effect in Childcare Use: A Matter of Policies or Preference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5(6): 878-893.
- Polanyi, K.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2nd Beacon Paperback ed.). Boston: Beacon Press.
- Sacchi, S., Pancaldi, F. & Arisi, C. (2011). *The Economic Crisis as a Trigger of Convergence? Short-time Work in Italy, Germany and Austria*. Carlo Alberto Working Paper No.199. Moncalieri: Collegio Carlo Alberto.
- Sakamoto, T. (2021). "Do Social Investment Policies Reduce Income Inequality? An Analysis of Industrial Countries."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31(4): 440-456.
- Sanders, T. (2016). "Concluding Thoughts: The Consequences of a 'Not-So-Big Society'." In Malcolm Harrison and Teela Sanders (eds.), *Social Policies and Social Control: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Not-So-Big Society'*, pp.199-210. Bristol: Policy Press.
- Saraceno, C. (2015). "A Critical Look to the Social Investment Approach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Soci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der, State & Society* 22(2): 257-269.
- Titmuss, R. M. (1974). *Social Polic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Zaidi, A., Harper, S., Howse, K., Lamura, G. & Perek-Białas, J. (eds.). (2018). *Building Evidence for Active Ageing Policies: Active Ageing Index and Its Potential*.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